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The indigenize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ministry poetry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民國時期大陸事工新詩的本色化特徵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Xue, Yuanyuan
Publisher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Chung Chi College, Shatin, Hong Kong
Rights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Chung Chi College, Shatin, Hong Kong
Download date	2026-07-08 03:23:43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3978250">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3978250</a>

The Indigenize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Ministry Poetry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民國時期大陸事工新詩的本色化特徵

XUE YUANYUAN  
薛媛元

*Abstract*

The modern ministry poetry is non-singing poetry written by Christians for the missionary purpose. In this paper, the modern ministry poetry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flourishing from 1921 to 1949 will be studi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ristian Indigenization Campaign in the 1920s. Compared with western religious poetry, the objective of modern ministry poetry is clearly directed to missionary work. The contents of the poetry widely involve secular life, and the quality and writing skills of different modern ministry poems are disparate. These characteristics came

---

XUE Yuanyuan 薛媛元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本文曾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6年12月舉辦之第八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本文標題所指的「本色化」，據吳智勳：〈神學本土化的原則〉，《神思》47（2000年11月），<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periodical/spirit/S047B>；段琦：《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5；本色化和本土化可理解為同義詞。但由於本論文的探討時段為1921至1949的民國時期，故仍採用民國的「本色化」說法。

from the special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49) and gradually faded after 1949.

Key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49), the Chinese Mainland, modern ministry poetry, Christian Indigenization Campaign

事工新詩是基督徒為了宣教而創作的非歌唱型現代詩歌。本文將 1921 至 1949 年間中國大陸的事工新詩置於本色化運動的背景下考察，認為事工新詩是基督教詩歌進入中國後的變種，與西方宗教詩歌相比，其本色化特徵包括：創作目標明確指向宣教、題材廣涉世俗生活，至於新詩的藝術水準則參差不齊。這些特徵是民國特殊年代的產物，1949 年後已逐步淡化。

關鍵字：民國、大陸、事工新詩、本色化運動

### 一、引言：作為基督教詩歌本色化變種的事工新詩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隨着新文化派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日益敵視，醞釀已久的基督教本色化運動也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在爭取傳教釋教話語權的過程中，中國基督徒對文字事工的熱情空前高漲，基督教詩歌的譯介與創作也進入了繁榮期。在這一過程中，大陸產生了一種新的詩歌。它以傳統格律詩或現代詩形式寫成，不配樂；內容不限於敬拜讚美而廣泛涉及到信徒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體現了基督教的觀念及精神，具有較強的宣教動機；多發表於基督教刊物，但預設讀者明顯包含非信徒。筆者稱這些由基督徒創作、具有宣教意圖的非歌唱型詩歌為「事工詩歌」；事工詩歌中的現代詩歌，簡稱為「事工新詩」。

「事工新詩」屬於基督教本色化氛圍催生的特殊基督教詩歌，可以視為基督教詩歌在民國大陸地區的變種。考察「基督教詩歌」概念在大陸專著、期刊論文及學位論文中的使用情況可以發

現，<sup>1</sup>由於 Christian verse 和 Christian poetry 都被統譯作「基督教詩歌」，目前大陸學界「基督教詩歌」的使用率較低但涵蓋面極廣。不同語境中基督教詩歌有不同的所指：在藝術和宗教領域（也包括普通民眾的理解），它指基督教禮拜中所用的、帶有較強儀式感的配樂讚美詩和起應頌詩，常用名稱是「聖詩」、「聖歌」或「讚美詩」；在西方文學研究領域，它指基督教題材詩歌或體現了宗教精神、情懷的詩歌，常用名稱是「宗教詩歌」（即艾略特所謂的「次要詩歌」）；<sup>2</sup>而在中國文學研究界，這一概念往往被不加界定而直接使用，含義對應西方文學中的「宗教詩歌」，但因「宗教」在中國不具有特指性，因此具體化為「基督教詩歌」。只有周偉馳曾將其界定為「基督徒詩人寫的具有基督教精神氣質的詩歌」，<sup>3</sup>強調作者的信徒身分，以與「有基督性的詩歌」（一般詩人寫的帶有基督教世界觀元素的詩歌）相區分，但這只是一家之言，並不具有權威地位。

基督教詩歌在進入擁有強勢本土文化的中國社會之後，已失去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的權威性，變成了弱勢的小眾詩歌。此時它已與西方「宗教詩歌」大相徑庭，成了一種文字事工的手段，<sup>4</sup>按艾略特的說法，屬於「基督教文學」的第三種類型，即「誠心誠意想達到宗教的目的」、「可以列入『宣傳』項下的作品」。<sup>5</sup>而在寫作主體成為中國人之後，基督教詩歌不可避免地帶上了中國

<sup>1</sup> 據有限統計，「基督教詩歌」這種表述共計在 2 部專著、53 篇期刊論文和 47 篇學位論文中出現過，合計次數不超過 150 次，在相關論題的論文中使用率遠低於 1%。

<sup>2</sup> 艾略特：〈宗教與文學〉，載艾略特：《艾略特詩學文集》，王恩衷編譯（北京：國際文化，1989），129。

<sup>3</sup> 周偉馳：〈當代中國基督教詩歌及其思想史脈絡〉，《新詩評論》（2009 年 2 月）：72-73。

<sup>4</sup> 陳建明：〈緒論〉，《近代基督教在華西地區文字事工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2），1。在基督教的傳教活動中，文字與佈道、教育、醫療、慈善並列為五大事工，而文字事工又包括文字創作與翻譯、書報刊印刷、出版、發行等，事工詩歌創作正屬於「文字創作與翻譯」部分。

<sup>5</sup> 艾略特：〈宗教與文學〉，130。此文中艾略特提到對基督教文學的三種理解：1、被強稱為文學的基督教領域內的歷史或科學文本；2、虔誠的文學，即以基督教相關話題為題材的詩歌，西方的「宗教詩歌」主要指這一類；3、宣傳的文學。

傳統思想的影響痕跡，也滲入了中國基督徒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非基風潮中日漸強烈的身分認同焦慮。在這種局勢下，它蛻變成作為國人福音宣傳物的特殊基督教詩歌，可名之為事工詩歌。

在諸類事工詩歌之中，事工新詩是最具時代特色的一種。有志於擺脫西教士影響、建立本土教會、改變中國民眾對基督徒之偏見的基督教新文化知識分子（尤其是劉廷芳等文學研究會成員）已經意識到了文字事工的重要性。1921年，他們懷着向主流文化靠攏的願望，利用新詩這種風靡於青年和新型知識分子之中的文學革命急先鋒文體，以全國徵稿的形式嘗試組織起事工新詩的創作。可以說，事工新詩的出現是文學革命、新詩發展與基督教新文化運動結合的產物。

本論文探討的事工新詩作品主要來源於1921至1949年間發行於中國大陸、影響較大的基督教刊物與基督徒個人詩集。筆者將在文本梳理與分析的基礎上，從基督教地域化和市場化的角度，總結事工新詩在中國社會轉型大背景下的創作特徵。

## 二、宣教：事工新詩創作目標的明確化與具體化

無論是直接的、對內的福音事工還是間接的、對外的宣教事工，其根本目的都在於宣揚基督教。這種寫作初衷決定了事工新詩在宗教與詩歌的關係權衡中，會無條件向宗教宣傳傾斜。此時事工詩人不自覺地走了一條詩歌工具化的道路，從本質上講，這一點與延安詩歌、抗戰詩歌並無區別，區別僅在於宣傳內容和寫作真誠度。

由於宣傳的考量，事工新詩配合本色化運動的主張，包括配合「中華國民的教會」、「富有中華文化素質的」、「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合而為一的」、「適應中華民族的精神和心理的」，<sup>6</sup>主要期待實現以下目標：

---

<sup>6</sup> 段琦：《奮進的歷程》，5。

## (一) 展示耶穌的屬世美和人性美

以冰心、聞一多等為代表的一類「不完全信徒」會因仰慕耶穌人格而對基督教產生好感、受洗皈依，但他們對聖經的諸多超自然記載不以為然，就如冰心所言：

主義救不了世界，  
學說救不了世界，  
要參與那造化的妙功呵，  
只有你那純潔高尚的人格。<sup>7</sup>

在本質上這種「人格救國」思想與新文化運動的「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存在一定呼應關係，體現出基督徒知識分子兼具啟蒙意識和信仰精神的雙重精神氣質。因此，事工詩人會利用這種接受心理，以「人格救國」精神為指導，在事工新詩中着重表現耶穌的屬世美德和人性一面，賦予「人子耶穌」極大的親和力。他們筆下的耶穌可以是「望着耶路撒冷而哭」的「加利利人」<sup>8</sup>愛國者，或「也是背負重軛的苦人，/也曾經過了他的客西馬尼」<sup>9</sup>的民眾同胞，或「耶穌的運動，/是全民眾的，根源極卑微，/再也不要讓閩人來崇拜，/把民眾變做貴族的東西」<sup>10</sup>的革命者，或祈求「使杯子離我」<sup>11</sup>的軟弱者等。這些對於耶穌多側面的刻畫，豐富了神子的形象，極大地拉近了神人距離，正契合了五四以來知識界崇人性去神性的「人的發現」思潮。

---

<sup>7</sup> 冰心：〈人格〉，《晨報》，1921年6月28日，4。

<sup>8</sup> 知為：〈冬至日朝陽門外〉，《生命》4.4-5（1924年1月）：詩1-2。

<sup>9</sup> 趙紫宸：〈聖誕前一夕〉，《生命》4.4-5（1924年1月）：聖誕詩2。

<sup>10</sup> 趙紫宸：〈莫忘〉，《真理與生命》6.8（1932年6月）：39。

<sup>11</sup> 趙紫宸：〈客西瑪尼〉，《生命》2.4（1921年11月）：詩1-2。

## （二）塑造富有中華傳統美德的本土基督徒形象

林語堂曾言，在中國「只有基督徒能產生基督徒，而基督教神學則不能」。<sup>12</sup> 中國人接受信仰多半是因受到品行出眾的基督徒影響，於是事工新詩也將「樹典型」作為了一種極有中國特色的宣傳策略。如劉廷芳的《老牧師》<sup>13</sup> 塑造了一位任勞任怨、退休後仍以言行傳揚福音的可敬牧師形象，充滿了「鞠躬盡粹，死而後已」的奉獻精神和淡泊名利的傳統美德。趙紫宸的《牧師經》則寫盡了本土牧師對上帝熱心服事、為教友殫精竭慮卻又忍受着西教士壓迫和非信徒唾罵<sup>14</sup> 的艱難窘境與滿腹辛酸，讚揚了他們「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忍不拔。相似作品還有陸志韋的《寄保和》、趙紫宸的《偶遇》、《兩個牧師》、《莫忘》等。這些詩歌意在破除人們對於基督徒「洋奴」的成見，使他們的形象與傳統文化相結連，找回基督徒的國人身分。

## （三）樹立去歐美化的獨立中華教會形象

本色化運動一大要務即去除歐美教會的傳統與色彩，實現自治、自養、自傳，因此與西方教會劃清界限就是一種必要的姿態。然而這種劃清界限並非無原則排外，而是一種有的放矢的批評。如陳國梁的《馬鈴薯》尖刻地嘲諷了一位對貧餓老婦空談愛心卻不加援助的「狄會吏」，<sup>15</sup> 揭露了不良西教師追求皈依業績卻不問教眾生死的冷酷；覺華的《我懷疑了！》對西教士「犧牲博愛」、「幫助中國，謀求幸福」<sup>16</sup> 等說辭提出嚴厲質疑，直斥部分傳教士假傳教真

<sup>12</sup> 林語堂：《從異教徒到基督徒》，謝綺霞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166。

<sup>13</sup> 劉廷芳：〈老牧師〉，《紫晶》8.2（1935年6月）：356-57。

<sup>14</sup> 趙紫宸：〈牧師經〉，《生命》2.9-10（1922年6月）：詩1-4。

<sup>15</sup> 陳國梁：〈馬鈴薯〉，《真理週刊》1.17（1923年7月）：4。

<sup>16</sup> 覺華：〈我懷疑了〉，《真理週刊》3.16（1925年7月）：3。

殖民的虛偽；趙紫宸的《牧師經》也通過對比西教士的驕奢與本土牧師的清苦，對西教士的高傲姿態和淡漠涼薄表達了強烈的不滿。這些極富批判意識的事工新詩主要發表在《真理週刊》等較為純粹的本色化刊物中，它們與前述「樹典型」類作品兩相對照，樹立起一個正在成長中的、真正為廣大教眾着想的頑強中華教會形象，力圖喚起中國民眾的認同感。

#### （四）以民族化的方式演繹及重解聖經

周太玄曾總結，中國人「對於與政治教育有關係的宗教，反很厭棄」。<sup>17</sup> 因此說教、宣講的傳教效果往往不佳，但以演經的方式宣教則不失為事工新詩的良好創作思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冰心的「聖詩」系列即演經詩歌，此外還有冰心的《天嬰》、劉廷蔚的散文詩《哀籲——為魏士毅女士作》、徐雉的詩劇《復活》等，其內容多涉及耶穌的誕生、受難、復活及其他聖經經典篇章、優美段落等。在這類詩歌中，事工詩人注重本色化思想、時代特色與詩人個性特徵的滲透。如同為聖誕詩，林鴻飛的《曠野》重視戰士耶穌的堅忍英勇，趙紫宸的《聖誕前一夕》則強調「他也是背負重軛的苦人」<sup>18</sup>；陳得源着眼於「髑髏處的 / 白楊茫茫， / 白墳蕭蕭！」<sup>19</sup> 的悲劇感；諦牟則肯定「所以紀念耶穌誕辰，更以紀念比其誕辰為尤要尤重者」<sup>20</sup> 的耶穌人格力量。在語言上，為便於民眾接受，演經詩歌追求平實流暢，甚至採用方言口語，如陸志韋《黑影兒》中的「油沒得了」<sup>21</sup>、徐雉詩劇《復活》中的「曉得」、浪子家僕人的名字「阿四」<sup>22</sup> 等。這可以視為宣教語言本色化在詩歌領域的體現。

<sup>17</sup> 周太玄：〈宗教與中國之將來〉，《少年中國》3.1（1921年8月）：30。

<sup>18</sup> 趙紫宸：〈聖誕前一夕〉，聖誕詩2。

<sup>19</sup> 陳得源：〈聖誕詩〉，《生命》5.5（1925年2月）：59。

<sup>20</sup> 諦牟：〈假使〉，《生命》5.2（1924年11月）：79。

<sup>21</sup> 知為：〈黑影兒〉，《生命》2.1（1921年6月）：詩3。

<sup>22</sup> 徐雉：〈復活〉，《青年進步》139（1931年1月）：121。

事工新詩也會解答人們對基督教教義的疑問，如吳雷川的《耶穌復生頌詞》解釋了「復活」、「永生」等理念，趙紫宸的《小倉別墅》闡述了科學宗教和諧共存思想，佩之的《上帝是愛》試圖調和基督教與進化觀的矛盾，吳雷川提出的「於今世界文明啟，/我儕觀念當遷徙」<sup>23</sup>和趙紫宸《兩個牧師》的論辯則表明了宗教與進化的相容性。這些釋經詩歌試圖通過對教義的注解和補充溝通基督精神與其他主義，表現出事工詩人消除誤解和偏見、爭取多元文化和平共處的強烈願望。

#### （五）批評異教信仰

基督教在進入中國之後面臨的強大文化抵抗，不僅限於同時傳入的西方人文主義思潮與長期統治中國思想界的儒家文化，還包括具有強大民眾基礎的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對於前者，本色化基督徒採取認同、妥協、為我所用的態度，而對於以偶像崇拜為特徵的異教信仰，則頗為不以為然。誠然基督教在中國表現出的排他性遠不及在西方強烈，甚至可謂相當溫和或曰慎重，但這些都是表面姿態，對異教的排斥仍會在不經意間流露於事工詩人筆端。如趙紫宸的《趕佛》諷刺了不踏螻蟻卻漠視人命的虛偽「婆心」<sup>24</sup>及其對窮苦人的欺騙；陸志韋的《動與靜》冷嘲了婆羅門無意義的所謂「大道」<sup>25</sup>；劉廷蔚的《遊廬山黃龍寺——十三年寒風》揶揄了和尚的世故和功利；朱味腴的《謝火神》、陸志韋的《治喪》、《紙錢》等則關注到迷信陋俗帶給百姓的苦難。但事工新詩旨在化解基督教與中國民眾的誤解與矛盾，本色化運動領袖更倡導信教自由，所以他們對群眾基礎廣泛的異教總體仍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態度，有意壓抑了批評異教的衝動。

<sup>23</sup> 吳震春：〈恭祝——聖誕〉（耶穌聖誕祝詞），《真理週刊》1.39（1923年12月）：1。

<sup>24</sup> 趙紫宸：〈趕佛〉，《生命》4.9-10（1924年6月）：詩1。

<sup>25</sup> 陸志韋：〈動與靜〉，載《渡河》（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67。

對於事工新詩的宣教價值，圖書館學家劉廷藩早在事工新詩誕生初期就在〈教會文字事業的問題〉<sup>26</sup>一文中給予了肯定。這些作品在當年以詩歌形式參與了本色化建設，在今天則從詩的角度還原了當年非基運動的真實面貌，具有不可忽視的史料價值。

### 三、包羅萬象：事工新詩題材的廣泛化與世俗化

基督教文化專屬的「榮神益人」精神基因要求事工新詩「必當與上帝的工作協同擴展，又當配合人民的急需」。<sup>27</sup>這意味着它在宣教的同時，又須兼具現實主義詩歌「為人生」的社會功能。民國時期中國獨有的社會環境使當時中國大陸的事工新詩不會像艾略特所謂的「小詩歌」那樣局限於某一特定範圍、給自己打上特定標籤。正如基督教五大事工涉及到社會生活諸多方面，事工詩歌的題材也可包含日常生活內容，只要達到宣教目的即可。所以有些事工詩歌乍讀不覺其為宗教詩，但詩中充滿宗教暗示，會誘發讀者對基督教的好感，就如醫療事工和慈善事工一般在潛移默化中達到宣教目的。這類非典型事工詩歌的題材則主要包括如下幾種：

#### （一）教友情誼的展示

這類事工新詩以教會弟兄姊妹的情誼和信徒夫妻的愛情為主要書寫對象，內容多涉及宗教生活，但不絕對，詩人重點表現的是一種世俗朋友或夫婦之間難於達到的屬靈相通境界。如劉廷芳的《戰壕中遺囑》、《煨蓮到京就職後第三個星期》、《懇求》表達了與好友共同振興中華教會的懇切與豪情，蔣翼振的燕大追憶系列詩歌《話別燕京》、《別六人團》、《寄王俊賢》、《寄燕大張景宋》、《寄燕大六人團》等記錄了教友在燕大進修期間共同聚會、天壇靈

<sup>26</sup> 劉廷藩：〈教會文字事業的問題〉，《生命》3.2（1922年10月）：2。

<sup>27</sup> 許光迪：〈中國基督教會文字事業的問題〉，《生命》3.2（1922年10月）：3。

修、徹夜談心的團契生活，其中惺惺相惜、天涯咫尺等情感都表達得相當真摯。陸志韋《新婚後又須僕僕從公》、趙紫宸《婚之夕》等愛情詩則帶有一定《雅歌》影響痕跡，把新婚夫婦的骨肉愛情與對上帝的信仰融為一體，兼具基督教詩歌的靈性之美和中國傳統愛情詩歌的纏綿悱惻。這些以感情書寫為主的事工新詩投合了中國人重情重義的傳統文化心理，令讀者油然而生神往之情，進而轉變人們對基督徒的印象。

## （二）社會時局的批判

中國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文以載道」、「文章救世」思想與社會福音派在中國的風行，使民國大陸事工詩人在社會改良、政府建言方面具有很高的參與熱情。這種「願為苦難的人們分担〔擔〕重軛／震發未來宇宙的洪聲」<sup>28</sup>的參與意識為事工新詩注入了現實主義的血液，使它不至局限於神人關係書寫的狹隘範疇，獲得了批判力量與鬥爭精神。然而與世俗現實主義詩歌不同的是，耶穌之愛使事工新詩比追求先破後立的革命鬥爭型批判多了一分寬容，事工新詩依據上帝誠命作出的含有期待意味的責備也帶有較強的改良意味，更容易為人所接受。

時局批評主題貫穿於事工新詩的整個發展過程，二十年代即已出現，在 1945 至 1949 年達到高潮，數量可觀。這些詩或以「天國」為參照，或以公元前後的以色列國相類比，或以地獄相警告，審視變革時期的中國，或直或曲地指斥社會中種種亂象怪象，如劉岷菴《哀冬》中的戰亂、佚名《無題》中的民不聊生、朱味腴《雪》、辛鶯子《背起戰鬥的十字架》中的剝削壓迫及越堅《耶路撒冷啊》、《撒都該的哲學》中的政府昏聩等，觸及了現實生活的各個領域。宣傳動機決定事工新詩的時局批判不甘止於展示現象或提出問題，而是有參與、指導現實的意圖。當然，基督之愛並非立

<sup>28</sup> 佚名：〈財寶〉，《女鐸》23.6（1934年11月）：59。

竿見影的短效藥，面對嚴酷的社會現實，事工新詩的建設與指導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事工新詩的參與意識源於「我們認你為父，我們就知道我們人類都是弟兄」<sup>29</sup>的平等觀，因此時局批判類詩歌深具為情著詩的真誠性，其中的同情、急切、哀傷、憤怒等情感真實而由衷，因而其苦難書寫、戰爭書寫、死亡書寫也能帶給讀者感同身受的閱讀體驗。它們向讀者展示了基督徒屬世的一面：拿起聖經合起雙手，他們是上帝的子民；下到戰場走上街頭，他們也是中國的公民。這類具有現實意義的詩作比之愛國情懷的自我表白有更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提升了人們對於本土基督徒的認同感，在重塑中華基督徒形象過程中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 （三）美善生活的記錄

事工新詩也多以美善為主題，通過對造化之奇、世界之美、自然之愛、人類之善的書寫，喚起人們對上帝創造之功和完全之愛的禮讚與感恩，以及對具有普世價值之教義的認同。冰心的《讚美所見》、趙紫宸的《山花》、蘇鴻圖的《司夏的神來了》、劉廷蔚的《獻詩給母親》、劉廷芳的《世界還有她》、田韞璞的《小孩》等都在美善的發現之途中作出了不同的採擷。這類事工新詩的寫作策略、傳情方式與世俗詩歌有相通之處，多以意象作為暗示，甚至全文無一字涉及基督教，但各個隱喻意象卻無一不讓人聯想到基督教。如陸志韋的《王三死了》<sup>30</sup>講述了打漁人王三為救自己落水的仇人而死、其犧牲又感動了其他漁民行善的故事，全詩並未涉及神、信仰一類字眼，但故事本身就是一個隱喻，同時打漁人的意象包含了「得人如得魚」的典故，為仇敵而獻出生命的行為暗示有「為罪人而死」的寬容饒恕教訓，漁民們收斂王三、奉養遺孀的義行又傳達了「麥粒因死得生」的道理。這類詩歌具有極大的普適

<sup>29</sup> 吳震春：〈我們在天上的父〉（主禱文演詞之一），《真理週刊》1.37（1923年12月）：3。

<sup>30</sup> 陸志韋：〈王三死了〉，載陸志韋：《渡河》，42-44。

性，其寫作目的是要做一種傳教前的預備，不求立竿見影的宣教效果，而是將教義融入詩歌之中潛移默化地傳達給非信徒讀者，使讀者在一朝明瞭該詩與基督教的關聯之後，產生頓悟的快感與認同感，進而生出繼續瞭解基督教的欲望。

#### 四、參差不齊：事工新詩藝術水準的業餘化

事工新詩的藝術水平不高是很多基督教文學鼓吹者的心頭之痛。趙紫宸在加拿大演說時曾沉痛地指出了這個事實：「在中國之基督徒，所面對之缺乏，為有力量有效能之基督教文學，堪以與變化無窮之非基督教大小書刊相競爭者。」<sup>31</sup>而造成這一局面主要有兩個原因。

##### （一）組織鬆散、發表隨意

事工新詩的寫作如前文所述，是以鬆散的全國徵稿形式組織起來的，所以比之其他各類事工，它顯得缺乏計劃性和系統性。甚至事工新詩最早的誕生也很偶然：劉廷芳在《生命》1卷8期發表了冰心的《詩篇》主題詩歌五首和他本人的譯詩時，只是嘗試將新詩引入基督教文壇，未料這些新詩的宣教價值很快得到認可，趙紫宸、陸志韋、劉廷芳、劉廷藩、劉廷蔚等人陸續加入，事工新詩才漸成規模，組稿發表漸入正軌。但即便如此，集中發表事工新詩的基督教刊物也不過數種——《生命》、《真理週刊》、《真理與生命》、《青年進步》、《紫晶》、《田家半月報》、《天風》，且都未設置固定的新詩專欄，而是隨機安排發表，未曾大力推介。同時這些刊物除《田家半月報》外都屬精英刊物，發行量非常有限，使事工新詩長期處於一種小圈子寫作的狀態。雖有小部分詩人也曾

<sup>31</sup> 朱維之：〈中國基督教文化界一大損失——悼劉廷芳博士〉，《天風》83（1947年8月）：10。

向世俗刊物投稿或在世俗出版社出版詩集，但整體而言，在非基運動後，世俗文壇對事工新詩的態度仍較為冷淡，雖隨時間推移敵視態度在逐漸減弱，但事工新詩在世俗文壇的影響力依然十分有限。

## （二）創作群體的非專業化

事工新詩整體上呈現出明顯的非職業寫作特徵，大多詩人沒有經過專門訓練，創作隨意，藝術不成熟，又因宣教動機導致作品理念性強、詩味不足，更匱乏於理論探索與形式創新，甚至還有校對粗略、邏輯不通等低級錯誤。如陳紉梅的《被難的小生命》<sup>32</sup>記述了淞滬會戰後日軍在春申江邊殘殺一個中國孩子的過程，旨在傳達對上帝之道遭受踐踏的悲憤，但詩中卻突兀地出現了「燒夷彈與重炮奏着交響的天籟」這種對戰爭帶有欣賞意味的句子，與全詩情感背道而馳。再如劉廷芳《中央公園夜中的柏樹》，<sup>33</sup>開篇描繪了水災後農民的苦難與絕望，然而隨後又寫起自己泛舟搏浪、休憩靜思的祥和愉悅，農夫的苦難被遺忘，頗有虎頭蛇尾之嫌。潘慧庵《雨後的斜陽》<sup>34</sup>更因「上帝立約標誌說」粗暴拒絕對彩虹成因的科學解釋，導致了詩歌境界的狹隘。這些都嚴重降低了事工新詩的格調，給讀者留下了粗製濫造的印象。

然而事工詩壇也非沒有傑出的詩人和詩作，如趙紫宸以他深沉的思考尋求着耶穌對人類的啟示，劉廷芳三兄弟以他們廣闊的視野開拓着上帝的文學領地，陸志韋以他超越的境界為信仰探索着更多可能。此外，董曦轡的《不成的兒戲》、《歲月老人》、彭善璋的《小詩》、柯家龍的《悔》、《永恆之樂》、越堅的《苦海中的珊瑚》、《死亡》等作品也兼具可讀性與智識性，放入現代詩壇也不顯遜色，同時吳雷川之典雅、米星如之豐富、蔣振翼之激情、田韞璞之清新等也都在各個枝蔓上裝飾着事工詩壇的藝術之林，均堪

<sup>32</sup> 陳紉梅：〈被難的小生命〉，《女鐸》21.5（1932年10月）：63-64。

<sup>33</sup> 劉廷芳：〈中央公園夜中的柏樹〉，《真理週刊》2.38（1924年12月）：2-3。

<sup>34</sup> 潘慧庵：〈雨後的斜陽〉，《青年進步》77（1924年11月）：96-97。

稱事工詩壇的翹楚。但總體說來，事工新詩的水平參差不齊是造成其文壇競爭力不足的重要癥結。

### 五、結論：不可複製的「繁榮」

基督教第四次入華後的認同危機、「非基運動」引發的強大輿論壓力、主流知識界對基督教的抵制態度、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局給中國本土基督徒帶來了民族情感與宗教情感的爭戰和被逐出本國主流話語體系的焦慮，繼而引發了極強的申辯需求和自證欲望，使他們不甘放棄一切尋求基督教與民族傳統間之相通與平衡、為自己的信仰尋求合法性的方式。由是，本土基督徒的空前宣教熱情與新文化運動後誕生的充滿革命意味和現代意味的新詩文體相遇合，加之基督教詩歌向非基督教文化圈遷徙的自身需要，共同造就了事工新詩在民國大陸這一特殊時期特殊環境中不可複製的繁榮，及其創作目標明指宣教、題材廣涉世俗生活、藝術水準參差不齊等三大本色化特徵。然而繁榮也只是相對於它之後的發展狀況而言，事實上事工新詩自誕生以來一直處於三不管的尷尬位置：在基督教文藝界，詩歌的主流是讚美詩，事工新詩是知識階層的陽春白雪；而在世俗文藝界，基督教不受歡迎，相關詩歌也一向處於邊緣地位。但即便生存環境惡劣，事工新詩也從未停止它頑強的發展，努力發揮宣教功能，直到徹底失去言說空間，而這正是「把福音傳到地極」的信仰精神之最完美的寫照。

1949 年後，中國大陸的基督教詩歌其實沒有完全沉寂，但 1976 年前的地下基督教詩歌寫作多呈現為一種獨語狀態，不再具有事工性；文革後回歸的基督教詩歌則以靈性詩歌、神性詩歌、神本主義詩歌等形式重現文壇，此時的基督教詩歌已不再有 1949 年前那種焦慮感，更專注於個人屬靈體驗書寫，在這個意義上，它正逐漸與國際上的宗教詩歌接軌。雖然如今興盛於民國大陸的事工新詩已不再活躍，但或許這才是中國基督教詩歌應有的發展方向。